

薛暮桥文集

第十三卷



中国金融出版社

薛暮桥文集

第十三卷

(1988—1989)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铁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封面设计：吴锦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薛暮桥文集 (Xue Muqiao Wenji) / 薛暮桥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

I. ①薛…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715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55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339

插页 2

字数 4718 千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0 元 (总二十卷)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F. 546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目 录

第十三卷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真正发挥银行作用 (1988 年 1 月)	1
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1988 年 1 月)	4
《改革与理论上的突破》前言 (1988 年 2 月)	17
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1988 年 2 月)	21
《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1988 年 3 月)	30
自传 (1988 年 3 月)	40
要用新观念认识今天我国的私营经济 (1988 年 4 月)	46
稳定经济 深化改革 以改革总揽全局 (1988 年 4 月)	53
《徐雪寒文集》序 (1988 年 5 月)	61
“北海币”回忆录 (1988 年 5 月)	67

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	
(1988 年 6 月)	73
《冯定文集》序言	
(1988 年 7 月)	81
《企业法》和《破产法》生效以后	
(1988 年 7 月)	86
建立和发展行业民间自治团体	
(1988 年 10 月)	90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88 年 10 月)	95
地区规划必须服从全国统一规划	
——关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之我见	
(1988 年 11 月)	105
认真总结十年改革的经验	
——一个主要教训	
(1988 年 12 月)	108
关于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	
——就《关于改进计划方法的一些设想(初稿)》	
给国家计委党组的一封信	
(1989 年 1 月)	116
关于我国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1989 年 1 月)	123
试论广义的价值规律	
(1989 年 1 月)	125
就统计资料问题给张塞的信	
(1989 年 2 月)	133
认真提高统计资料的使用价值	
(1989 年 2 月)	135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难	
(1989 年 4 月)	139

建议改革财政承包制度	
(1989 年 4 月)	143
制定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制度	
(1989 年 5 月)	147
就“汇报”给姚依林的信	
(1989 年 8 月)	151
艰苦创业四十年	
(1989 年)	153
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	
(1989 年)	189
春蚕到死丝未尽	
——《傲霜集》代序	
(1989 年)	194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真正发挥银行作用*

(1988 年 1 月)

新年前夕，记者访问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薛老虽年逾八旬，但谈锋甚健。他对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

薛老首先就我国今年的金融政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对这一问题，当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1988 年的金融政策应当着眼于经济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1988 年的金融政策应着眼于加速经济发展。我认为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从 1984 年以来，我国货币发行量年年偏多，经济高速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不稳定因素，突出的表现是：市场商品供应紧张和物价不断上升。1987 年工业生产计划增长速度是 7%，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可能超过 14%。因此，我们目前担心的不是经济增长太慢，而是在高速增长中不稳定因素继续发展的问題。我认为，至少在最近几年内金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逐步缩小以至消除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点同中央计划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经济、稳定物价、深化改革”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关于货币发行和控制贷款问题，薛老指出，我国货币发行偏多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不健全，银行缺乏对贷款的充分的自主权，上级行政机关干预过多。我听说近年来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基本建设投资由减少指令性的财政拨款，逐步改为“市场调节”的银行贷款之后，一些部门和地区又提出一些基建项目“戴帽下达”，要银行提供贷款。这实

* 这是作者 1987 年底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由记者整理后发表于 1988 年 1 月 1 日《金融时报》。

实际上是从“指令性的财政拨款”，变为“指令性的银行贷款”，从吃财政的“大锅饭”，变成了吃银行的“大锅饭”。如果情况属实，这样的改实际上等于没改，后果可能更糟些。因为“指令性的财政拨款”毕竟还经过计委综合平衡，而这种多头的“指令性的银行贷款”，却没有经过任何机关综合平衡，因此更有可能突破计划贷款的限额。多年的实践表明，计划内投资很少突破计划，而计划外投资，除1981年外，几乎年年突破计划。近年来我国货币发行偏多和信贷失控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此外，报刊报道近年来不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有“指令性项目”，而且流动资金贷款也有“指令性项目”。比如有些企业产品滞销积压，本来应该停产或转产，可是工厂为完成承包指标和利润上缴任务，却极力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从而造成更多的产品积压，占用更多的流动资金。而一些地区的行政机构怕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难以处理，所以要求银行为其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帮助挽救企业。这种行政干预，用银行贷款来保产值、保盈利的做法，也是我国信贷失控、货币偏多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取消“指令性的贷款”，使银行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干预，拒绝某些“戴帽下达”的贷款指令，有权决定贷款的使用方向；根据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合理地使用资金，把贷款投放到国民经济最需要、最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上去。

在谈到今后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时，薛老援引了邓小平同志的话，“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他说，这个论断十分精辟，因为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有真正的银行。这是目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薛老接着说，真正的银行必须是一个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必须按照国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有对贷款的决定权并承担贷款的风险。如果有决定权的行政机关不承担投资风险，而承担贷款风险的银行又没有决定权，银行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银行。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实行商品经济所通行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则。十三大决定要对企业采取政企分开，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实现企业的

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同样，对银行也必须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实行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如果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就不是商品经济制度下的真正的企业；如果银行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银行，也不是真正的银行。企业体制的改革和银行体制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企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或者只负盈，不负亏，一旦出现了亏损，仍然躺在财政或银行身上吃大锅饭，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也很难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最后大家不得不被迫“吃发票子的大锅饭”，发生通货膨胀。

当然，行政机关可以向银行要求对某些企业提供贷款，但贷款的决定权应在银行。对有风险的贷款，银行可以要求企业提出担保。企业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时，银行可以拍卖其库存商品来追回贷款。这就是说，向银行贷款的企业都必须自己承担风险。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担保品，银行有权拒绝贷款。同样，银行也可以而且必须拒绝经过评审认为不合理的“戴帽下达”的指令性贷款。如果因此受到上级行政机关不公正的处分，检察部门应当出面支持银行。银行工作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体制改革必须是全面的，不但包括经济体制各方面的改革，而且包括政治体制各方面的改革。

最后，薛老指出：上面所讲的只是一般的原则，一个奋斗的目标。真正实行这个原则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因为推进新体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旧体制的抵制。十三大决定深化体制改革，要求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正在着手从各个方面积极推进这一进程。银行是国民经济的中心，是国民经济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搞好金融体制改革，将会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1988 年 1 月)

一、新理论的发展过程

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方针的根本性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近三十年时间，我们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互相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两者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管理制度，对经济统得很死，生产资料不通过市场，实行计划分配；消费品虽然通过市场，但对主要产品也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以致生产与需要脱节，计划与市场脱节，整个经济运转处于僵化状态。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要求，并且开始提出需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为了进行体制改革，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

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自然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入、逐步提高的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还没有明确提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79 年 3 月，陈云同志作了一个“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 本文原载《改革》1988 年第 1 期。

分)；(2) 市场调节部分（即不按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同志所说的市场调节，只包括不列入计划的部分，不包括列入指导性计划，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计划的部分。后来许多同志把指导性计划表述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市场调节的范围在表达方法上适当扩大，这是符合于国际通行的表达方法的。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十二大报告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相比，对改革的论述已前进了一步。报告中认为指令性计划不是计划管理的唯一形式，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管理的一种形式，并指出指导性计划是主要运用经济杠杆来保证其实现。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因为把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得过小，仅限于不列入计划的小商品，因此外国许多经济学家误认为我国将要缩小市场调节的范围，经济体制改革将要后退。我在几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反复解释，我们的改革决不会后退，而是要继续前进。事实也是如此。近几年我国不断扩大不纳入计划、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工农业产品品种的范围，对于纳入计划的产品，也不断缩小指令性的计划，扩大指导性的计划；而指导性计划事实上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或者说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总的来说，我们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是不断缩小，而是不断扩大。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重大的突破，指出：“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并指出：“应该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进一步作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

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这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赵紫阳同志在 1986 年 3 月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作了简要的说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的共同性，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性。他说：“我们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其总体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1987 年 10 月，赵紫阳同志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是上述思想的深入发展。

二、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

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理想的经济模式，是通过国家计划把宏观控制搞好，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经济搞活。宏观控制搞好，是微观经济搞活的先决条件；微观经济搞活，是打破社会主义经济过去的僵化状态，使它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关键。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所以它有可能也有必要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然不同于过去用行政手段进行的计划分配，而是要用市场商品交换来逐步代替过去的计划分配。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是要研究如何能把过去的计划分配，逐步过渡到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商品交换。要使我们的商品经济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必须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在宏观方面要实行有效的计划调节，在微观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模式称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过去我们采用苏联型的经济模式，在表面上似乎容易进行宏观控制，达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它的具体标志是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和国民经济比例协调，但其后果是国民经济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不断下降，虽然保持了较高的生产增长速度，但因生产与市场需要常常脱节，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在生产和建设方面，由于企业不但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连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也受到统购统销制度的束缚，以致技术难以进步，产品难以根据市场需要更新换代。再加上企业吃“大锅饭”，赚钱亏本一个样，职工捧“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积极性难以发挥出来。所以，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具体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财政上打破统收统支制度，让地方和企业保留一部分自有资金，地方可以自己创办适合市场需要的新的企业，或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企业也可以用自有资金来进行对企业的改建或扩建，也可以按市场需要，利用精减下来的劳动力创办新的企业。近年来打破条块分割制度，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企业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发展横向联系。在国有和集体企业之外，还发展了大量的个体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少数雇工经营的私营企业。过去基本建设投资几乎完全依靠财政拨款，现在除利用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外，还可以利用银行贷款，这就为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带来新的课题。过去职工的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现在除国家有计划地增加工资外，企业还可以把自有资金的一小部分用来增加工资或发奖金，因此还需要对消费基金进行宏观控制。目前国家的财政

拨款比较容易控制，地方和企业自有资金的使用，国家很难控制（只能规定几项使用原则）。银行贷款是国家可以控制的，办法是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但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过去我们宏观控制主要依靠财政一个渠道，现在要依靠财政、银行两个渠道。银行这个渠道逐渐要比财政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如何管好这两个渠道，是我们体制改革面临的新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采取苏联的计划管理模式，在体制改革中缺乏采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的经验，很难避免国民经济的宏观失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货币形态上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增长合计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从1985年以来，我们不断号召压缩基建规模，控制工资奖金，目的是逐步消灭失控所造成的后果。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年年都被突破，工资奖金的增长也突破原定计划。1986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工资奖金增长的幅度低于1985年，表明失控的现象有所缓和，但仍高于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宏观失控的现象仍未根本解决。1987年的计划又提出要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在1986年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而且为了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三保三压”的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重点建设、生产性建设，压计划外建设、非重点建设、非生产性建设。现在很难不突破原定计划，“三压”的方针近期还难以实现。

外国许多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常常出现“投资饥饿症”和工资奖金的互相攀比，以致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似乎这是难以医治的顽症。我们认为这个病症确实值得重视，但只要我们学会了利用经济办法进行宏观控制，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我们是能够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前面已经说到，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控制，主要手段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银行。利用财政手段进行宏观控制，我们的经验比较丰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和1980年两年曾经出现财政赤字，此后就逐渐趋向平衡。1986年和1987年两年又出现赤字，原因不是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过大，而是由于在前两年过热现象中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合计接近600亿元，比财政赤字（70亿元）大7倍多。消灭财政赤字

的根本办法，是通过消除过热现象来恢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在此基础上理顺经济关系，特别是理顺价格体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决不能停止体制改革而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利用银行手段进行宏观控制，是我们宏观控制中的薄弱环节。有1984年第四季度起，给各专业银行以按限额支配信贷资金的自主权，由于缺乏经验，各银行都把贷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基建规模过分膨胀。这一年的第四季度为了收购丰收的农产品，又大量增发货币。1985年开始控制银行信贷，但因基建规模过大，许多新建工厂建成投产后缺乏流动资金，又被迫增发货币。加工工业发展过快，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跟不上，致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1986年开始进一步改革银行的管理体制，用经济办法，即各国银行所通行的办法来管理银行，打破过去的资金吃“大锅饭”制度，鼓励各银行自己收集社会闲散资金，“以存支贷”，并鼓励各地区和专业银行之间的横向资金融通，开始建立金融市场。前几年一方面货币发行过多，另一方面又苦于缺乏流动资金，这种矛盾，只能依靠健全金融事业和金融制度来解决。近一二年，在这方面已有明显进步。

银行宏观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控制货币发行数量。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从50年代到70年代前期，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产生的经济危机，它们曾经实行凯恩斯主义，用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刺激投资。到7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的物价上升达到两位数，为了避免货币制度的崩溃，美英等国又开始采用弗里特曼的货币主义，开始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不惜因此而引起头几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负增长。

我国1981年第一季度曾经实行银行信贷的“急刹车”，这一季度也出现了工业的负增长，这一年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到4.1%。这次“急刹车”虽然放慢了工业增长速度，但这一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00多亿元，使1982年和1983年两年出现了比较宽松的环境。1985年以来，我们接受1981年第一季度的经验，银行信贷不实行“急刹车”而实行“软着陆”，使工业生产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缺点是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想刹而没有刹住。正确的办法是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约束

基建规模，而我们现在仍然是让基建规模的盲目膨胀来冲击货币发行量，我们必须把这种现象迅速改变过来。

西方国家采用货币主义，同我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它们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社会总生产（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中，常常出现的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所以过去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刺激需求。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物价盘旋上升，造成物价上升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现在实行货币主义，物价上升的幅度稍稍减小，但生产增长的幅度也随之下降。目前由于经济前景暗淡而股票价格猛跌，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危机。

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不是生产过剩，经常出现的是需求过旺，生产供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即使会使一部分超过市场需要的加工工业受到打击，生产增长速度暂时下降（可能有两三年降到5%~6%），但将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并造成一个比较良好（物资供求大体平衡）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物价体系的调整；有利于减少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达到财政收支的平衡。当然，在压缩基建规模的同时，还要压缩消费基金，把工资增长压缩到略低于生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赵紫阳同志在《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必须认识，在宏观上加强间接控制，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比之微观搞活，比之直接控制，更为复杂，更为困难，我们也更缺少经验。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与现在已采取的改革措施配起套来，并为进一步搞活企业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积极反应。”

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日、法国也制订经济计划，联邦德国称自己的经济为“社会市场经济”。美国70年代末改变政策，实行货币主义，名为反对国家干预，实际上仍然是通过货币发行来对经济进行宏观控制（同时利用财政税收政策）。但资本主义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价格完全放开，所以宏观控制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仍然免不了经济发展的盲目性。社会主义国家以生产资料公有

制为基础，除大量的指导性计划外，还有小量的（但对国民经济是起决定作用的）指令性计划，即使把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放开，计划性也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善于利用财政（主要是税收）、银行（主要是货币发行）两个工具，我们是可以更有力量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的。也正因为我们有可能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直接控制，所以我们往往滥用行政手段，忽视采取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以致在前一种控制放松以后，后一种控制跟不上去，导致宏观失控。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学会采取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发挥财政特别是银行的作用。在目前，控制货币发行是宏观控制的关键。用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方法来约束银行信贷，特别是约束基建规模，并用工资政策和税收政策来防止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保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这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三、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要“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小的方面（微观经济）放开放活，就是要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所以，决定又指出：“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价格体系的改革，是要逐步放开对价格的计划管理，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使价格基本上符合价值，这样来使各企业能够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自负盈亏，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各类商品的生产，能够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使它们能够符合市场需要，并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变化，彻底纠正过去在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下生产与市场需要经常脱节的不合理状态。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已经提出社会主义还有商品交换，因此必须自觉遵守价值规律。但他所说的自觉遵守价值规律，